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

戴　路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宝祐四年贡举是宋元之际文章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首先,吉州、庆元府等地士人群体应试活动兴盛,创造了地域举业的佳绩,它推广了时文技艺,扩大了科举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文章学的体系化和理论化。其次,士人阶层向上流动、寻求晋升的现实需求促进词科学的成熟,宝祐四年的词科取士推动了词学体系的完备,为骈体公文树立了写作范式。第三,宋元易代促使进士群体反思科举体制,突出了文人的价值担当,丰富了文章学的精神意蕴。

关键词:宝祐四年;贡举;宋元之际;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2-0099-07

宋理宗宝祐四年(丙辰,1256)贡举是晚宋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宝祐四年登科录》的留存使数百名进士的乡贯、家世、年辈、科目等信息相对完整地得到呈现。这一群体在宋元易代时的忠义气节历来广受好评,正如此榜进士蒋岩所言:“静观世运,历数人物,抗节不屈、忠血凝碧,泣抱龙髯、下从彭咸,累书辞聘、绝粒而逝,凡此皆丙辰榜中人也。”[1]522 四库馆臣亦云:“孤忠劲节,撑拄纲常,数百年后睹其姓名,尚凛然生敬。”[2]卷五七,521 文天祥与陆秀夫的殉国,谢枋得的守节,都为此榜进士增添了无数道德光环。而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样令人瞩目。清人黄士珣《观芝阶家藏宋椠宝祐四年登科录》云:

> 齐年六百一人细寻绎,就中慈溪黄氏名尤称。日钞四部揭精要,手劬栗尾书溪藤。通鉴今传胡氏注,海陵龙爪两本能纠绳。蠖居梅磵积岁月,借读一过嗤王胜。文章自与气节并,不朽盛业殊风灯。他如阆风先生榉林隐,双峰高弟罗庐陵。本堂云泉两有集,《乌衣集》传太府丞。[3]2223

黄士珣肯定了黄震的学识、胡三省(梅磵)的史才、罗椅(庐陵)的师承以及柴随亨兄弟(榉林隐)、舒岳祥(阆风)、陈著(本堂)、薛嵎(云泉)、陆梦发(乌衣)等人的文学成就。“文章自与气节并”,文星璀璨的宝祐四年进士群体谱写了宋元之际文化史的辉煌。为探寻“斯文”自身的发展脉络,我们以此年贡举为基点前后延伸,从应试背景、晋升途径、易代处境诸层面展开,考察进士群体的生活空间与交往状态,归纳他们在时文应试、古文评点、骈文写作方面的见解,关注他们对科举体制和文章价值的反思,把握这一时期文章学的嬗变轨迹。

一　地域士人群体与科举文章学的普及

理学在淳祐年间获得最高权力的认可,随着州县官学与书院的大量兴建,理学在地方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升。在《宋元学案》的“巽斋”“晦静”“双峰”“东发”“深宁”等学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宝祐四年诸多进士的学术源流,追踪其在地方社会的传播路径。与此同时,针对场屋应试的科举之学也在地域士人群体间广泛流传,体现在举子会社的组织、时文技巧

收稿日期:2016-09-0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9 批面上资助项目“南宋后期四六文与骈体文章学研究”(2016M590308)成果。

作者简介:戴路(1986—),男,重庆合川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章学。

的授受、应试书籍的编刻等方面。地域科考成绩与科举文章学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在六百人的进士名单中,来自江西吉州,浙东庆元府、台州,福建福州、兴化军的士人占据较大比重。除去人口、解额等因素,我们可以推定科举之学在这些地区的社会基础和影响范围。结合书籍刊印和士人活动情况,这种判断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

宋末元初文人王义山曰:"今世士子取科举之文,如诗、赋、论、策,蝇头细书,出于手泽者数十帙,类编先儒文集,前乎书肆所未有。口吟手抄,彪分胪列,其为帙十四。"[4]卷二八,196 按照科场文体收集和编排前人篇章,进行有针对性的模仿和拟作,这在宋季士人间较为普遍。以吉州为例,从欧阳守道、文天祥所作《省题诗序》《李氏赋编序》《拟解试策序》《危恕斋论序》《八韵关键序》等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士人围绕场屋各体进行了系统准备和训练。如《李氏赋编序》云:

> 李君编所谓《集贤赋》,实以资同业者读习之助也。其编始于今岁,推而上至端平甲午,继此皆以日月相次,凡省、监、郡邑学之所取皆在焉。魁文录其全篇,余则各韵各对,择其善者,其用工斯已勤矣。同业之士得之,足以省节录之劳,而他有以用其暇也。[5]卷八,570

可见此书专收理宗朝礼部和学校考试中的律赋,按时间顺序编排,或录入全篇,或择取佳句,以供研习。"同业之士"显示出一定规模的应试群体,"省节录之劳"表明群体间的分工协作。类似的律赋书籍还有"义山朱君"所编、文天祥为之题序的《八韵关键》:"若朱君,立例严,用功深,盖亦深达于时宜者。朱君执此以往,一日取先场屋。"[6]卷九,33b 科场试赋首先需精通声律、辨明法则,李氏之"用功勤"、朱氏之"立例严"均出于此。除了编选前人范文,吉州士人也将平时习作加以传播,相互交流:

> 诏举进士之岁,吾乡诸斋拟策四出,其间有志当世者亦书策可行。[5]卷九,578

> 吾州恕斋危先生,其所为论积成帙,学者争传为矜式。[6]卷九,27b

应举者各自练习策、论等场屋文体,又彼此鉴赏品题,选择佳篇作为典范。长期对体式文法的揣摩是成功及第的前提,如欧阳守道所言:"旷旬月而不习,则他日抽思良苦;他人之已中选者不时取而读之,则无以熟有司之程度。"[5]卷八,570 在宝祐四年贡举中,吉州士人表现不俗。文天祥的万言殿试策,"不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7]卷四一八,12533;彭方迥的省试《帝王要经大略论》,考官批云:"说有根据,造辞老苍,较之他作,气象大有不同,真可为省闱多士之冠。"[8]卷一 这些都折射出地域举业研习的良好成效。在它背后,吉州的整体教育文化水平发挥了重要影响。如欧阳守道所言,"吾庐陵士至二三万,挟策来游者,不于州学则于书院","三代国都乡党之学无所与于岩穴之士,后世山中之教不出于上之人主张,而今日兼之,我宋文风于是最盛矣"[5]卷一四,621。在此过程中,地方教育机构为应举士子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据文天祥《吉州州学贡士庄记》载,"为贡士计者,积仓裹粮,共其道路,先事而为之备","士得以直走行都,而无仆马后顾"[6]卷九,2。成熟的教育条件提高了士人应试的积极性,促进了科举文章学的繁荣,地域举业的兴盛反过来又引领地方学术文化的发展。

除了范文习作的编选流传,应试士人的交往活动亦是科举之学兴盛的重要指标,这在浙东庆元府、台州等地皆有显现。舒岳祥的外家王氏"与郑、叶诸公以读书应举相往来","三聚族多科目之士,往往捷铃交驰"[9]卷一二,445。陈著曾参与乡里"文会","凡秀于列,相先后登名入官,类有以自见于世。虽余不敏,晚亦侥倖"[10]卷九一,496。同乡士人的集会结社,有助于应试经验的分享与文章技艺的切磋。陈著友人张锴"诏岁进取之人置登云课社"[10]卷九一,496,他自己也曾参与"桂峰"课会,"毋独擅其已能,冀相忘于下问","得则相善,失则相规"[10]卷五三,25,这些都为一方士人驰骋场屋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地域士人群体的应试活动中,科举文章学不断发展,举子对文体属性的把握更加充分。在宝祐四年贡举中,殿试"策"文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仅文天祥以鸿篇名垂后世,同年应考者的廷对文字在当时也多有流传。刘克庄《尤溪赵宝廷策》云:"尤溪赵君肖翁,示余丙辰廷策一编,首尾八千余言,专以乾常二卦奉对。"[11]卷一〇八,4482 此策为闽士赵珏的殿试文章,其后单行流传。王义山《邓检阅林廷对跋》云:"伏读丙辰圣问,因得读臣林洋洋之对","臣林谓高明光大之说,武帝不足以当之。"[4]卷十,63 此为江西新淦进士邓林之作。此外,文天祥和姚勉分别有《跋李龙庚殿策》和《跋李彝甫廷对策稿》,策文的作者为宝祐四年的特奏名进士李龙庚(字彝甫),"自为举子

时，以策鸣场屋”[12]卷四一，288，“门人好事者取君所对策刻诸梓”[6]卷十，5a。另外，福州籍进士陈俞亦有策语传出，据刘辰翁《陈礼部墓志铭》载：“宝祐丙辰之策士也，既日昃，再驾临轩，有少年首上对彻，亲览卷首，有‘临御以来，如日正中’语。”[13]卷七，554 总之，此年殿试策的文字以各种形式在宋元之际流布，反映出进士群体对此种文体的重视。他们利用君臣交际的机会表达政治理想，对策文的价值立场、表达策略与言辞技巧有充分的体认。

从文体功能看，对策既属科场程式，决定考生的前途命运，又是一次与执政者交流意见的机会，上问下答、下情上陈，对即将入仕的举子而言意义重大。文天祥的老师欧阳守道曾感叹，“使得对天子，其不应故事、袭腐语，以负人禄位者欤”[5]卷九，578，强调撰策者的真知灼见。文天祥亦认为“定高下于殿陛之亲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选”[6]卷九，2a，强调殿试的神圣性，因而对策“非碌碌意，积蓄必有深厚”[6]卷十，5a。黄震也指出：“国家设科发策，正以伸天下敢言之气，一有拘忌，有司反先喑无声，嘻可叹已！然于斯时也，有能独谔谔其间，岂不诚奇士哉！”[14]卷九七，1052 在他看来，策文不应回避矛盾，要敢于提出批评意见和解决方案。这种对策文价值的体认，使宝祐四年进士的廷对表现屡获好评，如文天祥“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7]卷四一八，12533，赵珏“析义理极精，其辨忠邪、条治乱极沉着痛快，其规切君相极忠愤忧爱”[11]卷一〇八，4482。在君臣“酌和”之中，科举进士作为“天子门生”的价值担当得以体现，策文输忠陈义、进谏论政的文体功用也有所施行。

《文体明辨序说》云：“夫策之体，练治为上，工文次之。”[15]2101 从修辞技巧看，策文虽以实用为主，仍需讲究文势与辞采。欧阳守道认为策文“出入经史典故、古今格言，而润色之以文采”，“南叟有劲气，议论顾理是非，耻软熟雷同”[5]卷九，578，触及文体的审美属性。在这方面，宝祐四年进士黄震颇有体会：“某少习科举之业，日诵先生之文。观其理致之明白，如日昭而月揭；迹其气势之变动，如电掣而雷奔。此求之古文中犹杰出，而何程文之敢云。”[14]卷九五，1023 他研习举业时经常模仿的程文，正是陆鹏升的策文。《陆太博墓志铭》云：“所谓读其策，知其必能措置天下大事者，而恨未得望下风。”[14]卷九七，1052-1053 黄震赞赏陆文议论的条畅与气势的流动，这些审美元素正可从古文中寻得。策以说理论政为主，需汲取古文的行文技法，避免堆砌板滞。正如黄震点评叶适的对策曰：“大抵纯净，非近世排仗语为多者比也。”[14]卷六八，658 这些都涉及策文的审美风格与语辞技巧。

总之，策文在宝祐四年贡举中的典型意义，让我们看到进士群体在探索文体规律、总结写作经验、践行文章价值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其背后是吉州、庆元府等地士人群体研习举业的浓烈氛围。从集会结社、授课拟作、编选刊印到品题鉴赏，地域士人的应试活动一方面使得科举学问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传播，同时也让辨体析艺走向系统化与精细化，促进文章学的理论跃升。到宋元易代之际，《文章轨范》《论学绳尺》等文章学著作的产生，便离不开建阳士人群体的交往活动。谢枋得云：“某每以科举程文教子孙，见后进学文者，必劝之。”[16]卷六，4b 隐居建阳期间，他和魏天应、蔡正孙等人的相互切磋使文章技艺的探讨更加深入。他们在体式格法的剖析中归纳场屋之文的创作技巧，又涉及文章的普遍审美风格。如果说谢枋得在宝祐四年的成功及第离不开地域举业兴盛的时代背景，那么正是这种地域性与群体性推动了文章学的整合与传承，不因政权更迭和制度兴废而消散。

二　士人晋升与词科学的成熟

上述对应试活动的介绍主要是向前追溯，探讨进士成功及第的文化基础；接下来则着眼于他们获取功名后的晋升过程，追踪词科学的发展路径。词科是朝廷在进士科之外选拔公文写作人才的主要途径，考察制、诰、诏、表、檄、露布等十二种文体的撰制，考验士人对典章制度的熟悉程度和遣造四六语词的本领。宋末元初戴表元曰：“三舍、宏辞次贵”，“幸而得之，则冀不次之擢”[17]卷七，9b。词科通常能为底层官员提供快速上升的通道。刘壎云：“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大则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18]卷二一，440，指出了时文应举和词科应试在士人生涯中的先后顺序。刘克庄亦云：“施之于场屋者为内学，施之台阁者为外学”[11]卷一〇七，4457，内外之别基于应用场合的区分，更是人才选拔途径的差异。词科之学因而在进士科时文之外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学问。

在词科发展史上，宝祐四年是一个重要时间点。担任此年进士科殿试覆考官的王应麟，在殿试前三个月考中博学宏词科。其弟王应凤在进士考试中以

甲科第九的身份及第,随即在三年后再中博学宏词科。据《辞学指南·辞学题名》记载,在宝祐四年以前,博学宏词科已近五十年无人中举。填补空白的王应麟、王应凤兄弟为宋季士人昭示了一条问学求进之途,所谓"青春大科,撼动一世。紫霄阔步,凌历两制"[10]卷八九,485。以王应麟的仕途而论,从进士及第到考中词科的十五年,王氏官位不显,寄禄官阶仅止于从八品的从事郎。词科中第后的一年,王应麟由选人官阶的从事郎迁为京官序列的宣教郎,十九年后位至正三品的权礼部尚书,其间曾担任权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等职。王应凤也因公文写作的突出才能受到朝廷重视,"丞相知其能文词,召为太常博士,将以内制处之"[19]卷五,6215。研习"辞学"、加速晋升、位居两制、经纬"王言"是词科应试者的理想轨迹。例如,宝祐四年进士谢枋得便有此志向。据释道璨《无文印》卷十八《叠山谢架阁》载:

> 或言架阁胸中所存,浩浩不可遏,将决科于六题十二体之间,某以为未必然。或以为必然,比周生来,问之,则信然矣。架阁言语文章如春风行空,遇花成花、遇柳成柳,(满)天地间皆生机活法矣,所谓宏且博者,何假科名而行哉?[20]434-435

释道璨虽极力劝阻,但谢枋得似乎已为"六题十二体"的词科考试进行过准备,拟将文字特长运用到朝廷典册的撰写中。此外,与宝祐四年进士关系密切的江西丰城人王义山亦与词科之学关系密切。王氏与此年进士聂嘉为表亲,二人共同的老师杨攀龙曾应试博学宏词科。王义山阅读过周必大的宏词程文集,自身也有词科拟稿,"既壮,习词科,十二稿进卷,私拟百余篇","左帑容斋先生刘公元刚,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为之序"[4]卷四,28。文天祥为王义山的拟稿题跋云:

> 豫章王君义山元高自为举子时,独有志于此。国家大制诏、大诰令,拟诸其形容者丛巨册,其能出章逢占毕之士矣。元高登进士乙科,调永州司户参军,意若不自满,谋卒业以大科致身乃已。[6]卷十,5b-6a

像王义山这样已有进士出身但沉沦下僚的选人,可以通过词科考试获得改官升任的机会,甚至进入翰苑,承担朝廷文书的写作,跻身清要显贵的行列,所谓"以大科致身"。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载,博学宏词科分三等取人,每等或改选人为京官,或除授馆职,或减少磨勘期限,给"意若不自满"的底层官员提供晋升的机会。同时,考中词科意味着公文写作特长获得朝廷的认可,士人因此赢得声誉。前引释道璨"所谓宏且博者,何假科名而行哉"之语,折射出词科对文学声名的影响。文天祥另有《送韦主簿成功赴宏词科启》,"径辞矮屋,前赴大科"[6]卷七,16b,亦包含了对州县幕僚晋升驰誉的期待。

与依托进士选拔制度的时文之学相比,词科之学主要服务于选人的磨勘迁转,其背后是士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需求。一种文书写作之学,除了制度设计与社会流动的背景,更有文章价值、文体规范、修辞技巧等方面的独特性。文天祥《跋王元高词科拟稿》云:

> 我朝言治者曰庆历、元祐、乾淳,厥亦惟欧阳子、苏公兄弟、周益国、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为缫籍粉泽,功光当时,垂休无穷,岂曰小补之哉!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尚论其盛,则其浑厚浓郁,光明俊伟,百世之下想望风采,必于斯文乎是稽。传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不可已也如是。"[6]卷十,5b

词科制度自设立以来,受到朱熹、叶适等人的诟病,词科所试四六文常被加以浅陋无用的评价;文天祥此处则赋予"朝廷文字"较高的价值。他认为制诰典册能够鼓动天下,激励人心;词臣能够担负"斯文"的重任,从欧阳修、二苏到周必大、三洪,形成了一个词臣的文统。从文天祥汲引王应凤、王义山、韦成功等经历看,他对词科并无恶感,而是注重挖掘四六辞章的文化内涵。文天祥强调的"鼓天下之动",在咸淳、德祐间王应麟的制诰公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全祖望曰:"试观先生在两制时,晨夕所草辞命,犹思挽既涣之人心,读之令人泪下。"[21]卷八五,2867例如,王应麟《赐吕文德收复开州江面肃清奖谕诏》曰:"百将一心,凡履屐间当任;四牡三捷,从枕席上过师。运奇伐谋,并力逐北,俾投鞭之丑远遁,而阻隘之群一空。"[22]卷二,63此诏用桓玄、赵充国、苻坚、霍光等事,典雅而富有气势,在宋末的危急局势中具有激发人心、号召天下的功用,体现出四六公文的独特价值。

在词科文体规范和写作技巧的总结方面,王应麟《辞学指南》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在他看来,词科考试之文虽然与实际应用场合的文书不完全一致,但前者的格式与法度更严谨,具有典范意义。论及"制"体时,王应麟指出:"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

溪、周益公最为可法，盖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也。”[23]卷二，943 谈及“表”文时，他亦强调：“龙溪、北海所作尤近场屋之体，可以为式。”[23]卷三，970 可见，王应麟具有明确的文体自觉意识，他用场屋程式去衡量前人篇章，旨在归纳出一系列可遵循、可模仿、可推广的写作法则。由此视之，宋代词科考试“六题十二体”，作为一套文体规范系统，最终在《辞学指南》成型。而词科规范发挥的引领作用，使其最终演变为制、表等四六文体的普遍法则。只要翻阅明人《文章辨体序说》《诗文轨范》《文体明辨序说》等文体学著作，以及《尧山堂偶隽》《四六丛话》《宋四六话》等明清四六话，我们都能发现《辞学指南》的显著影响。在“辨体”过程中，除了明确边界、厘清源流、凸显属性，王应麟还注重揭示一联一句的具体做法。如“制头四句说除授之职，其下散语一段略说除授之意”[23]卷二，930，“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23]卷二，930，“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题二十字，须要见尽题目，又忌体贴太露”[23]卷三，970 等。这些都为后学之士揭示了具体可行的路径。

据袁桷回忆：“公（王应麟）曰：‘中是科者实有命，晚岁问难无以承，诸生徒自辱尔。’桷闻是语愧汗累日。”[24]卷二八，1344 王应麟传承词科衣钵的意识较为强烈，他对体式格法的细致探究，无不秉持金针度人的明确立场。袁桷的“愧汗”，包含了对词科价值的认同，他后来对公文写作技巧也多有留意。尽管入元以后词科不复存在，从袁桷身上仍可看到这种技艺的传承。袁桷有诗题为《潘景梁学士同在集贤朝夕与余论宏词源委》，大德七年（1303），他亦应试词臣：

> （阎先生）卒询于尝往还，以考其词学焉。桷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为制诰乎？”桷谢不敏。顷之，出片纸，令试制草，即具稿以进。阅一月，将登车，辄命撰庙学诏，如汉诏令体。冬十月，大会院属，令拟《进五朝实录表》，桷得预拟焉。先生始察而奖之，即署为应奉文字。[24]卷二四，1197-1198

袁桷所试制、诏、表，正是《辞学指南》悉心讲解的文体，“考其词学”之“词学”，与王应麟的学问一脉相承。四库馆臣评价袁桷曰：“其在朝践历清华，再入集贤，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2]卷一六七，1435 以此而论，“愧汗累日”的袁桷终究不负其师。

总之，及第后“意若不自满”、期待“不次之擢”的士阶层构成词科之学流衍传播的社会基础。宝祐四年的博学宏词科成就了王应麟的辞学理想，催生了《辞学指南》这样体系完备的文章学著作。词科之学的成熟，树立了四六公文的体式规范，普及了写作技能，使“代言”之才不因宋元易代而中断。

三　科举中止与文章反思

宝祐四年进士群体生活在王朝鼎革的特殊年代，他们对科举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反思，丰富了“斯文”的内涵。科举为人们提供识字、作文、问学的机会，塑造士人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提高社会的文化水准，促进人才流动，因而制度的反思与文章功用的探讨、文人价值的追问是多位一体的。文章学在此意义上，也就从知识和技艺的层面上升到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层次。

在论及宋元之际的文学走向时，“科举废而诗艺兴”是一个常见命题，但面对时文和诗歌的此消彼长的情势，科举进士时常充满无奈与反思。如舒岳祥《跋王榘孙诗》云：“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叹也已。叔范于举业甚工，今当弃其所已工，得不痛惜之乎。”[9]卷一二，441 由时文而诗歌，舒岳祥感受到科举进士阶层的不幸。在《俞宜民诗序》中，舒氏亦云：“盖富贵者，真识懵然，夫以科举寸晷之长猎取显仕，一生学问不出是矣，安能剂量诗人之铢两也。”[9]卷一〇，425 从褒诗人贬举子的言辞中，我们不难看出舒岳祥对科考制度的痛惜，对科举士人完整知识结构、丰富文化精神、充分价值担当的呼唤。

在此种反思中，逆向汲取异质文化的元素，充实文章的精神气魄，就显得必要。如谢枋得所云：

> 始知东南科举士，误天下苍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将家子不习时文者，可与谈天下事。[16]卷六，2
>
> 听其议论，觇其志趣，绝似西北人，无一点江南时文习气。[16]卷五，3a

科举、时文、士人已和东南、江南这些地域概念交融在一起，成为南宋文化共同体的象征。在南与北、读书人与“将家子”、文章事与“天下事”的碰撞中，自我优势何在，文人何为，是这个时代的沉思。谢枋得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 古之所谓经天纬地曰文者，必非场屋无用之文也。[16]卷六，5a

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文之事,皆大言无当也。[16]卷五,2b-3a

艺祖皇帝最重读书人,天地折缺之余,正望其整顿;人极倾颠之际,正望其扶持。[16]卷五,2a

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时文名,而捐躯报国,不畏锋镝斧钺,能使武夫心服,为国家延数十年之命者,仅得曹毅节、彭文子、余义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16]卷六,8b

从场屋应试之文走向经天纬地之文,从空谈性理之文走向扶危济世之文,这是谢枋得对文章功能与价值的拓展。他曾引用陆贽"兴王之良佐,皆季代之弃才"勉励他人,这种季世的郁结亦萦绕其怀,激起他兴起"斯文"的责任感。"武夫"的忠烈,"中原将家子"的见识,"西北人"的志趣,都足以弥补科举士人与文章的价值缺失。在谢枋得的交游圈内,闽士黄六有便与他的这种期待相契合。黄六有"坐太学,以文章为诸公贵人重客"[16]卷二,870,他出身于科举教育体制之下,"文章"未免场屋之习,但遭遇世变之后,个人风格有了极大改变:

携二子行五百里,教学以代耕,暇则历访先贤讲习之所,借书吟诵,著述不休。闻有好善而遗世者,虽穷途巅崖邃谷,必杖屦求见。遇某于途,立谈如莫逆交,气愈豪,志愈不屈。夜相与席地拥炉,谈太公大节,六有拊髀雀跃,若有契于心。[16]卷二,870

教学、著述是宋亡后读书人的普遍生活形态,像马六有这样四处游历寻访的经历,有助于改变科举时文之学造就的单一气质。所谓"太公大节",与谢枋得"谈天下事""使武夫心服"的志趣相符。"气愈豪,志愈不屈"正是谢氏提振"斯文"的方向。由此返观《文章轨范》对《放胆文》的编选,我们便不能理解谢枋得的用意。例如,《文章轨范》评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曰:"文有气力,有光焰,顿挫豪宕,读之快人意,可以发人才思。"[25]卷一,552 又如,《轨范》对"辩难攻击之文"的评价:"虽厉声色,虽露锋芒,然气力雄健,光焰长远,读之令人意强而神爽。"[25]卷二,556 编者对文章气势的看重,对雄豪风格的推举,饱含着对读书人鲜活生命力的期待。而该书《小心文》开卷选编苏洵《高祖论》、苏轼《范增论》《留侯论》《秦始皇扶苏论》等,在剖析文法之外,无不隐含着前述"谈太公大节""拊髀雀跃"的志趣,希望学文之人真正承担起措置天下的责任。谢氏曾感叹:"枋得有兴起斯文之意,倡而无和,言而无听。"[25]卷一,22-23《文章轨范》的编选,可视作他与天下士人的共勉。

以上从宝祐四年贡举事件入手,围绕应试背景、晋升途径和易代处境三个方面,对科举士人群体的活动状态进行了持续关注。宋元之际地方教育与应试活动的兴盛,使更多士人接触时文技艺,扩大了科举学的社会基础,也促进了文章学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士人阶层向上流动的现实需要,使文书写作技能的培养受到更多关注,词科之学的成熟,在四六公文的体制规式上具有典范意义。宋元易代给科举体制带来冲击,进士群体的应对,既是制度反思,又是价值追问和精神重寻,使文章学不仅仅停留于技艺层面,而是关乎一代读书人的生存处境。

参考文献:

[1]蒋岩.本堂集跋[G]//陈著.本堂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5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黄士珣.观芝阶家藏宋椠宝祐四年登科录[G]//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4]王义山.稼村类稿[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9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欧阳守道.巽斋文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G]//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218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魏天应,林子长.校正重刊单篇批点论学绳尺[M].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成化本.
[9]舒岳祥.阆风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陈著.本堂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5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M].辛更儒,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姚勉.雪坡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刘辰翁.须溪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86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黄震.黄氏日钞[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07-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G]//王水照.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6]谢枋得.叠山集[G]//四部丛刊续编:集部70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
[17]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集部228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18]刘壎.隐居通议[G]//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9]马泽,袁桷.延祐四明志[G]//宋元方志丛刊(6).北京:中华书局,1990.
[20]释道璨.无文印[G]//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5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2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3]王应麟.辞学指南[G]//王水照.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4]袁桷,杨亮.袁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5]谢枋得.文章轨范[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The Evolu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4th Year of Baoyou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Article Science in the Turn of the Song Dynasty into the Yuan Dynasty

DAI L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4th year of Baoyou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a landma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cle science in the turn of the Song Dynasty into the Yuan Dynasty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ly, the vivid taking par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Jizhou and Qianyuanfu made the record of local recommendation to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improved writing skills in that period, expanded social basi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promoted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article science. Secondly, the practical needs of intellectuals to seek higher social status facilitated the maturity of Ci. Using Ci as the examination form in the 4th year of Baoyou Period accelerated the perfection of Ci and set a perfect example for official documents in Pian form. Thirdly, the turn of the Song Dynasty into the Yuan Dynasty pushed the intellectuals to review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in turn reflecte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intellectuals and enriched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s of article science.

Key words: the 4th year of Baoyou Perio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turn of the Song Dynasty into the Yuan Dynasty; article science

[责任编辑:唐　普]